

## 近现代陶渊明研究的开创者梁启超<sup>\*</sup>

李剑锋

(山东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梁启超论陶不论是观点、方法、文风都开辟了陶渊明研究的一个全新时代。他格外看重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认为陶是屈原之后第二位最具个性的作家;从三个方面系统地论述了陶“潜伏的特性”;认为陶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其根本的人生观是自然和自由;提出和论证了陶享年五十六岁说。他在治陶方法上中西结合,注入鲜明的个性;在创作和做人上也受陶影响。他接受陶渊明有自娱、写史、启蒙、恋乡等数种动机。

**关键词:**梁启超;陶渊明;接受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02)03-0055-05

早在六、七岁时,据传梁启超已经接触过陶渊明诗文。《梁任公先生大事记》称“塾师以‘东篱客赏陶潜菊’命对,先生(按指梁启超)应曰:‘南国入思召伯棠’。”<sup>[1](P14)</sup>梁启超青少年时读书面很广,十二岁时就喜读姚氏《古文辞类纂》,<sup>[2](册2《文集》之十一《三十自述》, P16)</sup>十八岁时手批过《四库提要》,<sup>[1](P24)</sup>《古文辞类纂》引用到陶渊明诗文,《四库提要》介绍过《陶渊明集》。梁启超对陶渊明的主要接受成果,据中华书局版《饮冰室合集》第12册《饮冰室专集》(以下简称《专集》)之九十六《陶渊明》部分,它们是《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陶渊明年谱》、《陶集考证》、《陶集私定本》(仅有四篇),都是1920年后梁启超退出政界、专注学术时期的成果。《饮冰室合集》中还有其它零星接受陶渊明的言论、事实近30题。郭沫若谈到少年时代读梁启超文的感觉时,说:“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很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他的精彩。”<sup>[3](112)</sup>正像梁启超的一贯文风一样,他的论陶文字也表现出全新的现代气象,不论是观点、文风、方法都开辟了陶渊明研究的一个全新时代。

梁启超格外看重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梁启超论陶最为著名的论断是:

古代作家能够在作品中把他的个性活现出来的,屈原以后,我便数陶渊明。<sup>[2](册12《陶渊明之文艺</sup>

及其品格》, P1)

他以性灵、个性论诗人,曾称平生最恨模拟剽窃之作,“不作诗词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sup>[2](册7《专集》之二十二《夏威夷游记》, P189)</sup>认为汉赋“带点字书或类书的性质,但难在里头发现出什么性灵。”汉代五言诗和乐府中的好作品,虽见出性情,但“大半不能得作者主名”,建安以后才有“诗的家数”。他为什么独推陶渊明呢?他认为个性要“不共”,即“他的作品完全脱离模仿的套调,不是能和别人共有。”“‘建安七子’就难看出各人个性。”又认为性灵须“真”,“要绝无一点矫揉雕饰,把作者的实感,赤裸裸地全盘表现。”“像潘、陆、鲍、谢都太注重词藻了,总有点像涂脂抹粉的佳人,把真面目藏去几分,所以我记得唐以前的诗人,真能把他的个性整个端出来和我们相接触的,只有阮步兵和陶彭泽两个人,而陶尤为干脆鲜明。”<sup>[2](册12《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 P1-2)</sup>这种用个性来评判作家的价值取向,显然是受西方个性观念的影响,有鲜明的现代价值倾向,开启了现代读者以个性评定作家优劣的先河。

梁启超在《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中拈出“品格”二字论陶也开近世之先,也是他论陶最充分、系统的部分。“品格者人之所以为人,借以自立于一群之内者也。人必保持其高尚之品格,以受他人之尊敬,然后足以自存。否则人格不具,将为世所不

\* 收稿日期:2002-01-04

作者简介:李剑锋(1970—),男,山东沂水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

齿。”<sup>[2]</sup>(《文集》之十四《论中国国民之品格》, P1) 梁启超从“整个人格”观察、论述陶渊明,看到了陶渊明“冲远高洁”背后的另一面。梁启超称之为“潜伏的特性”,认为它是陶渊明“外表特性的来历”。这一“潜伏的特性”,梁启超概括为三点:<sup>[2]</sup>(《册12《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 P5-10)

“第一须知他是一位极热烈极有豪气的人。”“是极热血的人,若把他看成冷面厌世一派,那便大错了。”“在极闲适的诗境中,常常露出些奇情壮思来。”早在1904年,梁启超就在《中国武士道》所录《史记·荆轲列传》之后附录陶渊明《咏荆轲》诗以表现荆轲的“武德”,发扬其精神。1922年,在为清华学校“文学社诸生”的课外讲演中,<sup>[2]</sup>(《册4《文集》之三十七《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序言, P71) 梁启超说:“《咏荆轲》、《拟古》里头的‘荣荣窗下兰’、‘辞家夙严驾’、‘迢迢百尺楼’、‘种桑长江边’,《杂诗》里头的‘白日沦西河’、‘忆我少年时’等篇,都是表现他的阳性情感,应属于这一类。(笔者按:指表现热烈的情感)”<sup>[2]</sup>(《册4《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 P87) 足见梁启超对陶渊明的豪气深有体会。梁启超之所以如此看陶渊明,从其自身来说,主要是由于他本人就是一位极富激情、极有豪气的人。从历史影响来说,得力于朱熹和辛弃疾两人。朱熹曾说:“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的人如何说出这样言语来。”<sup>[4]</sup>(《论文》下,卷140) 这段话梁启超没有引用,但他引用了朱熹另一段话:“陶却是有力,但诗健而意闲。隐者多是带性负气之人。”并说“此语真能道著痒处。”<sup>[2]</sup>(《册12《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 P6) 辛弃疾一生爱陶,以“陶县令,是吾师。”<sup>[5]</sup>(《最高楼·吾衰矣》, P331) 曾说:“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sup>[5]</sup>(《贺新郎·把酒长亭说》, P236) “渊明似胜卧龙些。”<sup>[5]</sup>(《玉蝴蝶·贵偶偶然浑似》, P467) 朱熹、辛弃疾两人都体会、论说到陶渊明豪放的一面,梁启超多次论到朱熹,对朱熹思想很熟悉,陶集所附集说中又往往录有朱熹的评陶言论;辛弃疾是梁启超最崇敬的作家之一,曾为他作过年谱。梁启超受二人影响是很显然的。不同处是,梁启超又格外强调情感的热烈。这是前人所少道及的。

“第二须知他是一位缠绵悱恻最多情的人。”梁启超是从人际关系的诸方面来论证的。他说陶渊明对“家庭骨肉间的情爱”极为热烈。“他对于朋友的情意,又真率,又挚。”对男女情爱“他心苗上本来有极温润的情绪。”他“对已覆灭的旧朝不胜眷恋。”<sup>[2]</sup>(《册12《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 P2) 梁启超论诗极重感情,认为“天下最神圣的莫过于情感”,“自己腔子里那一团优美的情感养足了,再用美妙的技术把他表现出

来,才不辱没了艺术的价值。”<sup>[2]</sup>(《册4《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 P71-72) 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中将中国诗词的表情方式分为“奔迸的表情法”等六种方式。他的作品也是以激情动人。对于陶渊明,梁启超披情人文,从情感入手,发现其真率的特点,又格外注重其浓度,作多侧面论述,给人以新颖之感。古人论陶,往往回避情感或者曲为解说。苏轼等人认为陶渊明乃“知道”之人,<sup>[6]</sup>(《书陶渊明饮酒诗后》, P2112) “而无人之情”,<sup>[7]</sup>(晁补之《饮酒二十首同苏翰林先生次韵追和陶渊明》, P2766) 诗亦不滞于情。理学家以理观陶,认为陶诗是“经道之余”的产物,<sup>[8]</sup>(《费元甫陶靖节诗序》,卷五二) 是胸中之道的自然流露。即使是从“吟咏性情”角度论陶诗,也往往强调其超世遗物、委运任真的特点,以为陶渊明“当忧则忧,遇喜则喜,忽然忧乐两忘,则随所遇而皆适。”<sup>[9]</sup>(《蔡宽夫诗话》, P393) 《闲情赋》以其艳情描写,自萧统以后屡遭贬抑,虽有苏轼等人为其辩解,借口也是“好色而不淫”。<sup>[7]</sup>(《题文选》, P2093) 要之,陶诗情感的独立审美价值,因局限于封建道德价值观念,没有被光明正大地肯定,而梁启超因时代新风和个人性格,将陶渊明的情感凸现出来并给予高度赞赏,遂成现代陶渊明接受史上的新论和定论。

“第三须知他是一位极严正——道德责任心极重的人。”“一生得力处和用力处,却都在儒学。”“一生品格立脚点,大略近于孟子所说‘有所不为’‘不屑不洁’的狷者。到后来操养纯熟,便从这里头发现出人生真趣味来。若把他当作何晏、王衍那一派放达名士看待,又大错了。”<sup>[2]</sup>(《册12《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 P10) 陶渊明思想的基本倾向性一直是有争议的。苏轼首先提出陶渊明为“知道”之士,举的例子是“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sup>[7]</sup>(《书陶渊明饮酒诗后》, P2112) 苏轼在和陶诗中又以禅解陶,所以很容易让人以为陶渊明所知之道是佛家之道。苏轼的说法对宋人影响很大,像郭祥正<sup>[8]</sup>(《读渊明传》二百之二, P8865)、葛胜仲<sup>[10]</sup>(《书渊明集后》三首,卷8) 等认为陶渊明“达道”、“悟道”。葛立方《韵语阳秋》卷12直接以“第一达磨”比喻陶渊明。朱熹把陶渊明划归道家,说:“陶渊明亦只是老庄。”<sup>[4]</sup>(卷125) 朱熹之后的理学家却认为陶渊明是地道的儒家,如真德秀《跋黄瀛甫拟陶诗》云:“渊明之学正自经术中来。”<sup>[11]</sup>(卷16) 梁启超在此没有简单的认同前人之说。他认为陶渊明基本倾向于儒家,并具体为孟子所云之“狷者”,但他并没有否定陶渊明可能受其它时代思潮影响。在谈到“陶渊明那时的时代思潮”时,他首先谈到了玄学,然后又谈到佛教,说“渊明本是儒家出身,律己甚严,从不肯有一毫苟且卑鄙放荡的举

动,一面却又受了当时玄学和慧远一班佛教徒的影响,形成他自己独得的人生见解。”<sup>[2](册12《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15)</sup>这就说得很圆通,避免了说陶渊明专归某一派的偏执。这与他从完整的人格看陶渊明的做法是一致的。

梁启超在《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的“四”、“五”两部分论述到陶渊明最终归田经历过一番精神矛盾和物质贫困的折磨,但陶渊明却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一个。”这谈的实是陶对和谐境界的求索问题。在《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的最后一部分,论述了支撑陶渊明“高尚的品格和文艺”的“整个人生观”——“自然”和“自由”。梁启超拈出“自然”、“自由”二词论陶,极符合陶渊明实际,实属首创,开启了后代学人以“自然”、“自由”论陶的先河。“自然”一词为传统之特有,陶渊明集中也多次使用,而“自由”一词则不然,并非陶渊明集中所使用,元曲中虽屡屡出现此词,它却是梁公从西方借来的概念。“自由”(和“平等”)“实百年前法国革命时所标之旗帜,”“其功用之现于政治者,亦不过谓人人于法律内享有自由。”“伦理学家固最尊自由,其所谓自由者,谓使良心绝对自由,而不为肢体嗜欲之所制。今若为逸游淫荡放纵卑劣之行,试一返诸汝最初之良心,其必不以为可也亦明矣。而肢体之嗜欲起而挠之,汝不能制彼而反为所制,是汝为嗜欲之奴隶也。”<sup>[2](册8《专集》</sup>

之三十一《国民浅训》,117-18)很显然,梁启超论陶之自由不是政治功用上的自由,而近于伦理学“品性行事”意义上的自由。<sup>[2](同上)</sup>

梁启超《陶渊明年谱》的最大贡献在于提出并论证了陶渊明享年五十六岁说。梁启超对自己的发现颇为自信甚至自得,他在该谱前小序中交待说:

偶钩稽其作品年月,而前人所说,皆不能惬吾意。盖以吾所推定,陶公卒年仅五十六,而旧史、旧谱皆云六十三。缘此一误,他皆误矣。遂发愤自撰此谱,三日而成。

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年谱及其作法》中说:

有些人不止一部年谱,甲改做了乙又改做。如……陶渊明年谱,有吴仁杰、王质、丁晏和我做的四种。大概越发晚出,越发好些。<sup>[2](册12《专集》之九十九,167)</sup>

梁启超之前,保存较完备的绝不仅三种,他只是列举其代表而已。口气是相当自信的。“大概越发晚出,越发好些。”这话本虽就一般情况而言,不难看出也是夫子自道。的确,梁启超的五十六岁说在陶渊明

接受史上是功不可没的。最重要的恐怕是,它开启了现代陶渊明接受史上拥护与反对六十三岁说之争的先河。这至今仍是一个没有定论的公案。

在治陶方法上,梁启超在吸取传统的知人论世、考证求实的方法的同时,又吸取了西方近代从社会、政治、时代思潮等多角度做分析综合的方法,开启了现代治陶方法的先河。梁启超《陶渊明·自序》云:“欲治文学史,宜先刺取各时代代表之作者,察其时代背景与夫身世所经历,了解其特性及其思想之渊源及感受。”可见他在陶渊明研究方法上是有明确的理性认识的。在实际运用中,梁启超也是努力这样做的。如果说《陶渊明年谱》、《陶集考证》、《陶集私定本》用的基本是传统考证求实的方法,那么《陶渊明的文艺及其品格》主要用的是西方近代的科学方法。当然,贯穿其中的都是一种怀疑和创新的近现代精神。

在学术著作中融入自己的个性是梁启超治陶的又一鲜明特点。首先,发现或者说注重研究与自己个性相合拍的问题。如对陶渊明“潜伏的特性”的关注。陶渊明冲淡高远、静穆温和的一面,梁启超不是没有意识到,但他更感兴趣的却是陶渊明热烈豪放、个性鲜明的一面,这不能不说是研究者的个性起了作用。其次,在用语、文风上不淹没自己个性。特别是《陶渊明的文艺及其品格》一文,虽是学术论文,却与梁启超散文的风格相一致:观点警醒独到、行文畅达含情。有时不避俚俗口语,很能见出他的个性,如他分析《乞食》诗时说:“但他的饭肯胡乱吃吗?哼哼,他决不肯!”是模拟陶渊明的声口,也是梁启超自画肖像。从学术文章里,我们也见到了个人。再次,求实和怀疑是梁启超接受陶渊明以一贯之的鲜明特点。做年谱是从陶渊明诗文中找内证提出新观点,《陶集考证》虽是罗列古近所见陶集版本,又往往提出自己看法,梳理版本源流。《陶集私定本》只定了四首,每首编年,且考论理由,立意已见出异想,而方法又见出求实精神。

梁启超在创作、做人上也有受陶渊明影响的影子。他有时在诗词创作中化用陶诗语词典故,如“桃源”<sup>[2](册5《文集》之四十五下《奉怀南海先生星家坡兼致请东渡》,137)</sup>“千金躯”<sup>[2](同上《得聚一书报锐庵呕血其夕大风雨感喟不寐披衲走笔记诗以训》,147)</sup>“八表同昏”<sup>[2](同上《春阴》,152)</sup>“吾庐”<sup>[2](同上《庚戌岁暮感怀》,158)</sup>

等。有时借陶抒情言志,如作于1914年《对酒图五章章八句为寒季常题以浊醪有妙理为韵》第五章云:

渊明自欺世,止酒岂尝止?开口叹时运,不达乃至此。乞食本达尊,闲情况明理。图中形

影神, 哓哓其何已。<sup>[2](同上, P73)</sup>

此诗字面叹陶渊明徒有旷达之虚名, 实际抒发自己不能忘怀世事的情怀。有时诗风直追陶渊明, 如其《奥亚归舟赠小畔四郎》、《双涛园读书》等作有陶、白(居易)诗风。梁启超的人生观也有深受陶渊明影响的因素。他在《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中谈到陶渊明的品格, 许多观点实际是夫子自道。如他说: 陶渊明《自祭文》所云“勤靡馀劳, 心有常闲, 乐天委分以至百年”可以作为陶渊明人格的“总赞”。<sup>[2](册12《专集》之九十六, P21)</sup> 梁启超一生勤奋、忙碌, 但总能在忙处偷闲, 自找乐趣。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晚年在夫人患病陪床期间, 他在苦痛煎熬之余, 从古词中集句对了大量对联消磨时间。他自称之为“苦痛中的小玩意”。<sup>[2](册5《文集》之四十五上, P113)</sup> 他在《鹊桥仙·自题小影寄思成》中自白说:

忙处此心常暇。<sup>[2](册5《文集》之四十五下, P99)</sup>

这话简直就是上引陶渊明《自祭文》里的话的翻版! 而此词作于《陶渊明》出版之后的1925年, 足见梁启超人生观受陶影响之一斑。

梁启超曾说: “我所谓学问, 正不特智识一方而已, 尚有修养一方面在后。”<sup>[2](册12《专集》之一百三《儒家哲学》, P106)</sup> 梁启超对陶渊明的接受可以说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他既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陶渊明, 又在科学的研究基础之上深入体会和发掘了陶渊明的精神, 不论是在接受的成果上还是方法上都给后代读者以深远的影响和新鲜的启迪。

梁启超研究陶渊明有数种动机。最直接的动机是以陶集“自娱”。在集中关注陶渊明时, 梁启超正“养痾家居”, 而陶渊明是他最看重的诗人:

我最崇拜他(按: 指陶渊明)而且大着胆批评他。<sup>[2](册12《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 P2)</sup>

而实际上, 这“自娱”是很可打折扣的。梁启超一生共作过三个人的年谱: 1923年2月做成的《陶渊明年谱》, 同年做成的《朱舜水年谱》, 1928年写止的《辛弃疾年谱》。《陶渊明年谱》是做得最早的一个年谱。一开始的动机是“自娱”, 而一旦做开来, “学问欲”作怪, 便身不由己, 转到做学问、磨练性情、砥砺精神上来。<sup>[2](册12《专集》之九十九《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P88)</sup>

而根本的动机则是其文学史写作计划的一部分。梁启超说“欲治文学史, 宜先刺取各时代代表之作者, 察其时代背景与夫身世所经历, 了解其特性及其思想之渊源及感受。吾夙有志于是, 所从鹜者重, 病未能也。”<sup>[2](册12《陶渊明·自序》, P1)</sup> 写文学史是梁启超早有的本志, 只是由于其它事务过多, 难有余暇了此心

愿, 这一直是他所难以释怀的。梁启超有宏大的中国历史研究计划, 文学史是其中的一部分。1922年, 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 “今日所需之史, 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两途”并把文学史作为专门史的一种。1927年, 他又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六章《专传的做法》中说自己“常常有一种希奇的思想, 主张把中国全部文化约莫分为三部。(一)思想及其他学说, (二)政治及其他事业, (三)文学及其他艺术。”<sup>[2](册12, P90)</sup> 并建议为一百人作传, 认为“若做的好, 可以包括全部中国文化在一百篇内。”<sup>[2](同上)</sup> 关于文学, 陶渊明之前, 他仅列了屈原、司马相如、曹植(建安余子附), 其后便是陶渊明。梁启超的《陶渊明·自序》作于1923年4月, 《中国历史研究法》关于这一部分的讲述在1927年3月以后,<sup>[2](册12姚名达《中国历史研究法·跋》补编)</sup> 至少在前后四年间, 梁启超对文学史中的陶渊明一直深念不忘。如果联系到他平生最关注的作家如李白、杜甫都是在研究陶渊明前半年写成的事实, 联系到他总结文学史规律的《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也是作于1922年, 那么梁启超把陶渊明作为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进行研究的动机是无须怀疑的。

梁启超接受并研究陶渊明还有更深远的动机, 即借学术以加深思想启蒙, 加强对政治更深远、更有益的影响。梁启超从晚年退出政界, 转向学术研究与学术教育是深有意义的。它并非表明梁启超对政治、民族前途的淡漠, 相反, 它反而显示出梁启超对政治与民族前途的更深入的理解。他越来越从时局翻覆多变而国民依旧浅薄无知的现象中看到, 久远的政治、民族的未来并不在政客甚至政治家, 而在学术。学术才是“左右世界”的根本势力。政治、军事人物“当其盛也, 炙手可热, 威震环瀛, 一败之后, 其政治亦随身名而灭矣。然则天地间独一无二之大势力, 何在乎? 曰智而已矣, 学术而已矣。”<sup>[2](册1《文集》之六《论学术势力之左右世界》, P110)</sup> 而国民的“新元气决非枝枝节节吸收外国物质文明所能养成, 必须有内发的心力以为之主。”<sup>[1](《为创办文化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 P983)</sup> 这“内发的心力”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对传统文化的深入理解。《陶渊明》虽为养病自娱的产物, 但写出来后又定稿出版, 恐怕借学术以影响“国民性”、增强国民“内发的心力”的想法在起作用, 当然也不排除纯粹的学术动机(如以陶五十六岁说矫正传统六十三岁说)。

梁启超之喜爱陶渊明与他传统社会小农经济的温馨回忆有着似断实连的关系。其《哀启》云: “吾家自始迁新会十世为农, 至先王父教谕公始肆志于

学。”<sup>[2]</sup>(册8《专集》之三十三, P127) 其《三十自述》云:“先世自宋末由福州徙南雄,明末由南雄徙新会,定居焉。数百年栖于山谷。族之叔伯兄弟,且耕且读,不问世事,如桃源中人。”<sup>[2]</sup>(册2《文集》之十一第, P15) 又《悼启》云:“启超故贫,濒海乡居,世代耕且读,数亩薄田,举家躬耘,获以为恒。”<sup>[2]</sup>(册5《文集》之四十四上, P24) 又曾作《述归》诗云:“天若右(按当为佑)中国,我行岂徒然。待我拂衣还,理我旧桃源。”<sup>[2]</sup>(册5《文集》之四十五下, P68) 对家乡的回忆、对半耕半读的小农生活方式的回忆令他温馨的想起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这大约也是他晚年生病时读陶集自娱的潜层动机。

## 参考文献:

- [1]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 [2]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4.
- [3] 郭沫若.少年时代[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 [4] 黎德靖.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5] 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6]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7] 全宋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 [8] 魏了翁.魏鹤山集[M].台北: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影印本,1983.
- [9] 郭绍虞辑.宋诗话辑佚[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10] 葛胜仲.丹阳集[M].台北: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影印本,1983.
- [11] 真德秀.西山文集[M].台北: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影印本,1983.

## Liang Qichao, Forerunner of Modern Tao Yuanming Study

Li Jianfeng

(College of Arts and Mass Media,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Abstract:** Liang Qichao, who opened up a new era of Tao Yuanming completely with his viewpoint, method and article style,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tatus of Tao in literay history and believed that Tao was the second most important author with bright character after Qu Yuan. Liang Qichao discussed “the hidden character” of Tao from three aspects. He believed that Tao, whose basic outlook on life was natural and free, was the happiest person in the world. He found and proved that Tao had died when he was fifty-six. Liang Qichao, who was influenced by Tao on literary creation and life linked the method of China with the west and poured character into the study of Tao. The reasons why Liang Qichao accepted Tao lied in four aspects, which were self-amusement, writing history, enlightening people and thinking of hometown.

**Key words:** liang Qichao; Tao Yuanming; accept

责任编辑:方晓明